

新疆历史丛话

(第一集)

谷 芭 等 著



532083

研究所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 次

坎儿井的故事·····	谷 苞 (1)
养蚕織絹的技术是怎样由内地传入新疆的·····	谷 苞 (10)
棉花、瓜果、蔬菜及其它·····	谷 苞 (16)
从天馬說到伊犁馬·····	谷 苞 (22)
駝、騾·····	谷 苞 (29)
古代紙張和印刷术在新疆的传播·····	徐伯夫 (37)
漫話葡萄·····	王治来 (42)
张騫两次出使西域·····	徐伯夫 (48)
細君公主与解忧公主·····	其 平 (54)
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	徐伯夫 (60)
唐朝少数民族將領契苾何力二三事·····	郭平梁 (68)
阿史那社尔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为人·····	郭平梁 (72)
元代維吾尔族农学家魯明善·····	王治来 (79)

介紹明代新疆的一位历史家

- 穆哈璽德·海答儿……………王治来 (86)
- 清代学者徐松对新疆史地研究的貢獻……………刘美崧 (93)
- 洪亮吉和他有关新疆的著作……………刘仲良 (102)
- 魏氏高昌国的一百四十一年……………谷 苞 (113)
- “汉日天种”与“姑娘城”的传说……………郭平梁 (123)
- 1912年的哈密农民起义……………李炳东 (127)
- 帝国主义分子对新疆文物的掠夺……………王治来 (132)

坎儿井的故事

谷 苞

坎儿井（井渠）是两千年前由汉族劳动人民发明創造，并經由新疆各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揚光大的。它的老家在陝西省大荔县，自西汉时代起便在新疆安家落戶了。这一段史实值得大書特書，值得謳歌贊頌。因为它是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对战胜干旱、保証农业丰收的一大貢獻，而且也是历史上汉族与新疆各族人民在經濟、文化交流方面的一个极有意义的事例。

关于坎儿井流传到新疆的历史，历史学家王国維曾經写过一篇考据文章，題名曰《西域井渠考》（見《观堂集林》卷十三）。全文虽不足五百字，却論据确凿，令人信服。坎儿井于公元前109年以前便在大荔出現了。据《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載：“民願穿洛（今陝西省之洛河。引者注，下同），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頃攻鹵地（盐碱地）。誠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今陝西省澄城县）引洛水至商顏下（位于今陝西省大荔县北）。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下流）以絕（到

达)商顏,东至山峯十余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汉書》卷二十九《沟洫志》也有着和上文相同的記載。这条渠在汉朝叫做龙首渠。此后不久大荔县的井渠,便传到了甘肃敦煌和新疆的白龙堆沙漠地区。白龙堆的位置在罗布泊的东面,因該地区散布着許多高出地面几十米高的小山,沟谷內堆积的流沙蜿蜒如龙,再加上地面白色的盐碱土,故名曰白龙堆沙漠。这里是古代由内地到西域所必經的处所,虽因缺乏水草,行旅非常艰苦,但地理位置却很重要。《汉書·西域传》有这样一段話:“汉遣破羌將軍辛賢武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竖立表記),穿卑鞬侯井以西,欲通渠轉谷,积居庐仓以討之(設仓积谷准备攻打烏孙的烏就屠)。”①对于“卑鞬侯井”的解释,唐朝顏师古注《汉書·西域传》中曾引三国时注《汉書》的孟康的話說:“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以上所引的两段話,至少可以說明这样两个問題:一、大荔县的井渠在西汉时便已传到新疆的白龙堆沙漠地区了,只不过改称其名为卑鞬侯井或大井六通渠罢了。二、大荔县的井渠还只是利用地下渠道輸送地表水,而白龙堆沙漠地区的卑鞬侯井則已发展为引取“下泉流湧出”的地下水了。至于究竟何时井渠传到了哈密和吐鲁番地区,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問題。但大体上可以断言这个時間也應該是很早的。哈密和吐鲁番都是汉、唐时代軍隊屯垦的要地;既然屯垦的軍隊很早就把井渠法传到敦煌和白龙堆沙漠地区,因此,再把它传到哈密、吐鲁番一带,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可惜关于这方

面的情况历史記載很少。《新疆图志·建置志》卷二中說：“初，吐魯番有溉田久蕪，云貴总督林則徐（1785—1850年）謫戍伊犁，始濬托克逊及伊拉里克等渠，复增穿井渠通水，民用溫給。”林則徐貶官到新疆后曾提倡兴修水利确系事实。至于群众中盛传林則徐发明坎儿井的說法，那只是由于各族人民在爱戴这位民族英雄的情感下所构成的一个附会罢了②。至今吐魯番盆地許多坎儿井的名称还仍然沿用汉语名称，群众中也还流传着汉族人民帮助維吾尔族农民开凿坎儿井的故事。

有位水利专家告訴我說：吐魯番县木头沟里目前沒有在用的坎儿井。但有两条早已废弃了的坎儿井，据当地的維吾尔族农民說：它們是二百八十年前由汉族人开凿的，这两道井的名字便叫錢生貴坎儿井和光头坎儿井。又鄯善县二堡地方于前年修建了一座庫容四千万立方的水庫，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埧址下面有十几道早年埋在地下的坎儿井，需要在工程上加以特別处理。而这些被埋在地下的坎儿井，在修水庫以前当地群众都不知道，証明它們开凿、使用的年代是很早的。同时，在其地下渠道內还发现了銅制水烟袋，这証明汉族劳动人民是参加过修建这些坎儿井的。另外，挖掘坎儿井所使用的大部分工具，在当地少数民族中仍沿用着汉语名称，这也可看作坎儿井是自內地传入新疆的又一証据。王玉胡同志在《风災、干劲、丰收》（載1962年5月8—9日《新疆日报》）一文中談到的有关情况，也很能說明問題。文章說：“根据老人（尼牙孜坎儿匠）的講述，使我們知道这六道坎儿井都有很长的历史，虽然他也

无法講出它們修成的准确年代，但从好几代都是坎儿匠的身世来推断，至少也有一二百年了。他还講到最早的坎儿井是汉族人挖的，直到現在那些挖坎儿井的工具大部分都是汉语名称，如单轆、双轆、架子等等，另外那些坎儿井的名字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主人的更替而有所变化，但有一些較老的汉族名字还一直保留到今天。比如六道坎儿井中的当鋪坎、馬娃子坎。其次蒙古人和回族人也挖过坎，那埋掉的三道坎中的然更坎，就是一个蒙古名字（然更，官职名，相当于五百戶长）（然更疑为贊根——引者）。老人講到这些情况，主要說明这些坎儿井，都曾付出了各族劳动人民的血汗。”

外国資產階級的学者对于我国的历史总是爱发謬論的，法国的伯希和等曾胡說新疆的坎儿井是从波斯传入的。这原不足为怪，因为他們总是千方百計地貶低中国各族人民的发明創造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的貢獻，用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张目。奇怪的倒是，解放前在我国还居然有些人写書作文章附和这一謬論，真可謂之“数典忘祖”。直到目前还不能說他們的恶劣影响已經完全消除了。在汉朝时中亚薩馬尔罕一带連一般的井筒都不会凿，更不用說凿坎儿井了。据《史記·大宛列传》載，公元前102年，汉将李广利率軍队攻打大宛城时，了解到城中无井，食用的水依靠从城外流入。李广利虽派人堵住了水源，但是攻打四十多天，城內的守軍并没有受到缺水的威胁。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城內的汉人曾教当地人凿井取水的緣故。这就証明当时的大宛人还是不会凿井的。古代汉文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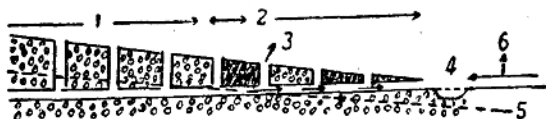
如《北史·西域傳》、《大唐西域記》等都沒有提到當時中亞各國有坎兒井的事。直到元朝劉郁於公元1262年3月所寫的《西使記》^①才有了有關“井渠”的記載。王國維先生在《西域井渠考》一文的結語中說：“劉郁西使記……所言與漢井渠之法無異，蓋東來賈胡以此土之法傳至彼國者，非由彼國傳來也。”我們認為這一結論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有人說：“坎兒井起源於波斯，十七世紀才傳到新疆”。他們說，波斯語稱井渠為坎兒孜，維吾爾語也稱坎兒孜，證明井渠是由波斯傳入新疆的。我們說這個“證據”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在新疆老早就有井渠了，而且用一個孤立的名詞來作證，既可以證過來，也可以證轉去。當把它證過來時是一個沒有其他旁證的孤證，而把它證轉去時，則是言之確鑿的，因為我國井渠發生、發展的歷史記載，是能夠坐實這一個論點的。另外，蘇聯水文地質學家庫寧在考察研究了新疆的坎兒井後說：“這兒的坎兒井在建造和利用的技術方面具有某些與中亞和伊朗（即波斯）不同的特點。證明這裡的坎兒井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所發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沒有採用中亞和中東地區坎兒井經營的傳統方法。”（B·H庫寧：《東天山山前平原地下水簡評》，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自然條件》）。庫寧的看法，也可以作為證實我們的論斷的一個佐證。

井渠法由內地傳入新疆，這是新疆農業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它對於改變新疆的自然面貌，保障農業豐收等方面曾經發揮了而且還繼續發揮着巨大的作用。據說目前全新疆的坎兒井

总数約一千五百道，主要分布于吐魯番盆地（包括吐魯番、鄯善和托克逊三个县）和哈密专区，少数分布于庫車綠洲和皮山县等地。根据1958年的資料，吐、鄯、托三个县的坎儿井共一千一百五十八道，其灌溉面积占該区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溫故”固然可以“知新”，看看眼前的现实，也有助于我們对古代情况的理解。长期以来，吐魯番盆地的农田主要是靠坎儿井灌溉的。在干旱地区沒有水利灌溉，是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的。新疆农諺說：“地靠水，树靠根；沒有水，地不生”，正好确切地說明了这个意思。吐魯番盆地是新疆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这里最低处低于海平面一百五十四米，最高气温曾达摄氏四十八度（1953年7月的資料，为全国最高纪录），年降水量在十七公厘以下。正由于有了坎儿井，才使得这块历史上被称为火洲的地方得到了潤泽哺育。在隋唐时代，它就以盛产棉花、葡萄和谷类而著名于世。到現在它仍然是我国种植棉花的一个良好基地，并以其特产无核白葡萄、甜瓜、西瓜等而名聞遐宇。由于有了坎儿井，吐魯番盆地才得以成为祖国錦綉山河中鮮艳夺目、独具特色的一个花園，也使它得以成为新疆許多美丽富饒的綠洲之一。

坎儿井的设计构思是异常巧妙的，它的建造工程也是异常艰巨宏伟的。它充分表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坎儿井是由直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以及地下与地面渠道接头的涝坝、地面渠道等几部分构成（見附图）。如图所示，

坎儿井結構示意图



- | | |
|-------------|--------|
| 1、地下渠道的进水部分 | 4、涝坝 |
| 2、地下渠道的出水部分 | 5、地下水面 |
| 3、直井 | 6、地面渠道 |

大約每隔二十到三十米便有一口直井通至地下渠道。一般說來，直井的深度愈往上游愈深，愈到下游愈淺。在坎儿井的上游，也就是最深的地方，直井是深入到地下水的含水層當中的，截引地下水流入地下渠道；在坎儿井的下游，直井的深度則在地下水的含水層以上。因此地下渠道的上段有引水和輸水的兩種作用，而地下渠道的下段則只有輸水的一種作用。坎儿井設計上的巧妙處在於不用任何提水工具，便能將地下水通過地下渠道流出地表，灌溉農田。坎儿井的長度一般為三公里左右，最長的達三十公里。直井淺處只幾米，深處二三十米，有的大坎儿井，直井深達六十至七十米。粗略估算，如果將新疆所有坎儿井連接起來，其長度可達兩三千公里，比起我國從北京到杭州全長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的大運河來要長得多④。因

此，曾有人說，坎儿井与长城、大运河可以媲美，可以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三大工程。依我看，这个說法是不算过分的。

在新疆生活了十三年，我曾有过多机会参观坎儿井，并訪問过翻了身的各族农民和人民公社。每当走近坎儿井时，我总爱抱起一捧清冽的坎儿井水，一飲而尽，頓感心曠神怡。这时再放眼展望丰腴的土地，遙望交河、高昌故城和石窟寺遗址，特别是每一想到两千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农民在解放前的苦难和解放后的欢乐，就有无限的感触涌上心头。我很想为坎儿井写一首頌歌，但苦于没有文学的才能总未如願，这里我就将已想过多次的几句话写出，作为本文的結語。

在夏季里燙得能烤熟鷄蛋的土地呵！

是誰把你哺育得如此富饒美丽？

我自問自答：是坎儿井水，

可是我自己又說：并不。

因为首先應該这样回答：

是百代各族劳动人民的血汗、勤劳和智慧，

还有两千多年汉族与新疆各族人民的友爱

灌溉了它、哺育了它。

我不禁怀着激动的情感高呼：

讓所有“外国人的恩惠”以及“大自然的恩惠”等謊言都滾远些吧！

①清朝徐松著《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補曰：宋祁云西當作西，通鑑注，謂時立表穿渠于卑鞞侯井以西。按今敦煌引党河等大渠，經縣西下流

入疏勒河，归哈喇淖尔，西即大漠，豈古大通渠遺迹耶？”

清朝徐松著《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補曰：通渠轉谷，秋水運也。盧倉謂建倉。國朝雍正中，大將軍岳鍾琪于党河漢水運。詳見余《西域水道記》中，倉注校作倉。”

②《林則徐日記》：“聞到上魯番六十里較短，遂復前行。二十里許，見沿途多土坑，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橫流者，由南而北，漸引漸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誠不可思議之事。”（中華書局出版，四四八頁）

③元朝劉郁撰《西使記》：“二十九日過噶堵儿城……地無水，土人隔山斲鑿井相沿數十里，下流以灌田。”（據《學津討原》叢書本）

④根據中國科學院新疆綜合考察隊的資料。

养蚕織絹的技术是怎样 由內地傳入新疆的

谷 苞

我国是絲絹的祖国。相传黃帝的妻子西陵氏（嫫祖）首先发明了养蚕的技术，尔后，养蚕織絹在国民經济生活中便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古代，对于我国农民來說，养蚕与种地是并重的，而不把它只当作一种副业看待，明朝澧川沈氏在所著的《补农書》中說：“农家以耕織为业”，“男耕女織农家本务”便是这个意思。在古代每年春天，連天子、諸侯及其后妃們也都躬亲采桑养蚕，并亲到先蚕坛祭祀先蚕——蚕絲的发明人西陵氏。历代的統治階級所以不忘“劝蚕事”，是因为养蚕織絹不仅可以解决穿衣問題，而且还能够从它身上謀取巨額的稅收。积千百年亿万劳动人民的、特別是妇女們的血汗，才使得我国的蚕桑事业历久不衰，并博得了蚕絲产品以绚丽灿烂而著称于世的美誉。养蚕織絹的技术达到了十分巧妙精湛的境地。

自从公元前二世紀，张騫两次通使西域后，絲絹便成为我国对外貿易中的一项主要商品。张騫带到西域的貨物，“賁金

币帛直（值）数千鉅万”（《汉書·张騫传》）。汉朝的富庶和絲絹的絢丽，引起了西域各国巨大的兴趣，大批的西域商人便以貢使为名相率到我国内地經商，正如《汉書·西域传》上所說，“欲通貨市賈，以献为名”。西域商人带来的貨物主要为毛織品及其他土、特产，运往西域各国的貨物主要为絲絹。絲絹首先被販运到新疆及当时的中亚各国，再經由波斯和印度商人之手轉运到欧洲的羅馬帝国出售。当时羅馬的貴族富豪竟相穿着用中国絲絹錦綉裁制的衣服，用以炫耀其生活的豪華。

由于絲絹出自中国，希腊羅馬人就將中国叫做賽里斯（Seres）——“絲絹之国”。由中国内地經新疆通向中亚及西欧的一条商路，也被称为“絲道”。它对于促进古代我国与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促进东方与西方經濟文化的共同发展，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

我国内地出产的絲絹，在公元前二世紀以前便传到了新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我国史書上有不少直接或間接的記述，且不多談。这里只就当时从内地运来新疆而被一直保存到現代的絲絹略談几句。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于1907年在甘肃敦煌古长城烽燧废墟曾发现两件絲絹。一件的末端写着：“任城国亢父（今山东济宁）織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錢六百一十八。”另一件是西汉末年的絲絹，末端書有波罗迷文，这两件絲絹都是要被运到西域的。（轉引自賀昌群著《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第4頁）1914年斯坦因又在罗布泊附近的古楼兰遗址的汉墓中发现了“光怪陆离的織

物，其中有美丽的彩絹 很美的地毯，同織品殘片，堆絨地毯，此外还有粗織的毛織物同毡子。”（向达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一〇八頁）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南疆的古代遗址、墓葬中所发现的汉代絲絹也是很多的。我曾参观过1959年自治区博物館在和田专区民丰县境内的尼雅遗址所发掘出的一男一女合葬的木乃伊，經初步鉴定，被認為是东汉时代的墓葬。这两个木乃伊穿的是汉錦衣服，質地甚佳，图案色彩都很美丽。許多汉唐絲織品在古絲道上能够保留至今，对于古絲道是一个活的見証，对于研究当时的經濟文化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絲絹传入新疆的时间在紀元前二世紀以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养蚕織絹的技术传入新疆的时间最迟不晚于公元七世紀，这一点也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在《魏書·高昌传》中就已經談到吐魯番地区“宜蚕”。公元644年，玄奘从印度取佛經返回长安途經于闐（今和田县）时，曾采訪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昔者此国未知桑蚕，聞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賜，严勅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薩旦那王（即于闐王——引者）乃卑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誡曰：‘尔致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絲綿，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惟王女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薩旦那国，止鹿射伽藍（佛寺）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

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养之，自时厥后，桑树連蔭。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遂为先蚕（养蚕的創始人），建此伽藍。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絲者，来年輒不宜蚕。”（《大唐西域記》卷十二）《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中也記述了这个故事。描繪这个故事情节的壁画，也于1914年在和田县丹丹威里克地方的一座废寺中被发现了。壁画的中間画着一个盛滿蚕茧的筐篮，右边画着出嫁到于闐的公主，左边画有一个侍女，侍女用左手指着公主的头部，表示其头发里藏有桑蚕种。公主的背后放着一架織机，表明蚕絲紡織的技术也同时传入了。另外还坐着一个男子，看来好像是古于闐国王。（見向达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四十五頁和三十一图）这个壁画的发现，是一件很凑巧也很有意义的事，它說明玄奘所講述的故事，在古代的于闐国是流行很广的。

遺憾的是，我們还没有看到过我国史書里有关这位公主的其他記述，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她的名字，更不知道有关她的其他事迹了。汉族公主把养蚕織絹技术传到新疆的故事，以娓娓动听的情节記述了新疆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发生是通过和亲来表现的，深刻地体现了自古以来汉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密联系。另外，这个故事和东晋干宝著《搜神記》中少女化为蚕的美妙神話，以及黃帝的妻子西陵氏发明养蚕的传說的共同特点，都是对妇女在养蚕事业中伟大功績的歌

頃。我国古代也曾把蚕直呼为“女儿”。（見后唐馬縞集：《中华古今注》卷下）长期以来，新疆的各族人民在蚕桑以及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經驗。

如果說內地生产的絲絹最先运到新疆出售的时候，还只能滿足貴族富豪奢侈生活的需要的話，那么养蚕織絹技术传入新疆以后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养蚕織絹作为农家經济的一个組成部分，可以大大增加农民的收益，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自从公元六、七世纪以来，新疆的南部就成了一个蚕桑生产很发达的地区。从那时起南疆的絲絹不仅供当地使用，而且还有可能提供对外貿易的商品。和田出产的絲“白克散絹”、絲絨地毯等一向聞名于国内外。近百年以来絲及絲織品一直都是出口的大宗商品。解放后，我曾先后三次到和田专区工作，当地蚕絲生产的情况对我有較深的印象。农民們告訴我，我也自己看到，解放后蚕桑生产确乎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現代化的蚕种場、繅絲厂、紡織厂的先后設立，以及公社养蚕場中先进技术的推广，标志着这个具有一千五百年以上历史的古老生产部門，已經走向了新生的道路。在繅絲厂里有上千的来自江浙的汉族姑娘和当地的維吾尔族少女，亲密地在一起劳动，相互学习。这些汉族姑娘也是和前面說过的那位公主一样是带着养蚕繅絲的技术来到新疆的。所不同者是她們带来的技术是更为进步的現代技术，更重要的还是在党的教育下她們带来了許多顆願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心。南疆是絲絹的产区，維吾尔族妇女尤其喜爱穿戴絲織品。当然，只有在